

中国是否跨越了 DEBAT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 杨涛 黄益平 / 主编

中国是否跨越了 刘易斯转折点

蔡 昉 杨 涛 黄益平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 杨涛, 黄益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097-2876-5

I. ①中… II. ①蔡… ②杨… ③黄…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 - 文集 IV. ①F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803 号

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主 编 / 蔡 昉 杨 涛 黄益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许秀江 恽 薇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师敏革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876-5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16.75

字 数 / 28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介绍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曲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郜若素 (Ross Garnaut)

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

葛苏勤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郝 睿 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教授

黄季焜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兼职教授

简·高莉 (Jane Golle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学院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教授

蒋庭松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中心高级经济学家

李 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罗斯高 (Scott Rozelle)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学院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海伦 (Helen Farnsworth) 高级研究员

马尔科·艾尔克兰尼 (Marco G. Ercolani)

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教授

孟 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经济研究院教授

-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 (Crawford) 经济学与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项目主任
-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王生林** 甘肃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 王晓兵**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魏 征** 宁波诺丁汉大学、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中国) 教授
- 杨 进**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心
- 杨 涛**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约翰·奈特 (John Knight)**
牛津大学名誉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海外名师”教授
- 张 珂** 彭博集团分析员
- 张林秀**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 张晓波**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目录

绪论	蔡 昉 杨 涛 黄益平 / 001
----------	-------------------

第一编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蔡 昉 / 007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	张晓波 杨 进 王生林 / 024
解析 1965 ~ 2009 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	
.....	魏 征 Marco G. Ercolani 郝 睿 / 050
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	
——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	王美艳 / 081

第二编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含义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和自营工商业的结构性转变	
.....	王晓兵 黄季焜 张林秀 / 099

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 一般均衡分析 黄益平 蒋庭松 / 119
- 刘易斯转折点的宏观经济学含义 郜若素 / 139
-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吗？ 宋立刚 张永生 / 150

第三编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不同观点

-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 Jane Golley 孟 昕 / 165
- 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 约翰·奈特 邓曲恒 李 实 / 196
- 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 基于省级数据的证据 姚 洋 张 珂 / 228
- 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葛苏勤 杨 涛 / 238

绪 论

蔡 昉 杨 涛 黄益平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通过大众媒体表达的观点众多，而研究类成果特别是经验性研究的成果较少，以致遭受批评的学者无从回应和辩解，希望参加争论的学者找不到对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家已经感受到工人难找和工资持续上涨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者通过考察官方统计数据，却发现起码还有数亿农村劳动力尚未实现转移，这也给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制造了新的困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努力工作，最近产生了一批严肃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收集的，就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所谓的“代表性”，一是指这些文章是认真的学术性研究成果，而非仅仅表达观点。作者们使用来源不同的数据，具有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启发的作用；二是论文作者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机构，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研究的学者；三是这些文章代表了不尽相同的观点，包括作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判断，或者得出这个转折点尚未到来的结论，甚至质疑应用刘易斯模型的有效性或者在中国的适用性。作为编者，我们相信，这个文集不仅具有立此存照的意义，也将有助于推进对这个领域的研究。

长期以来，研究者通过经验性观察，大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刘易斯理论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即在起点上，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以低下且不变的工资水平，源源不断地获得劳动力供给。直到 2003 年，中国第一次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随后蔓延到

其他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地区，并引起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按照刘易斯理论及费景汉和拉尼斯模型所做的扩展，这种以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及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发展阶段特征，标志着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如果劳动力短缺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将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这时，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还与人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密切相关。随着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就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会相应影响政府的就业政策，例如从以扩大就业数量为中心向更加注重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和结构性问题的转变。可见，转折点问题首先影响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也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刘易斯转折点具有诸多的政策含义，学界和政策界对于这个问题都很关注，并形成了诸多不尽相同的判断。然而，学术争论与政策争论往往有着相异的规范。政策判断有时会从结论的意义出发。例如，由于担心决策者对就业问题掉以轻心，政策研究者倾向于持之以恒地表达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判断，在理论上否定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便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经济学家论证观点的规范是实证检验，需要在经验结果的基础上，主张或反对某一种观点。本文集收入的文章，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都是采用了经验检验的方法。

不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研究这个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劳动力短缺是中国经济早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过去我国经济依赖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作为一个重要推动力，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帮助我国甚至其他经济体保持相对平稳的通货膨胀。一旦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将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发生重大变化，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要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通胀压力也可能出现新的局面。而这一些变化，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分工、产业分布及宏观格局。

本文集中的文章，很大一部分选自两本英文杂志的专刊。一是来自 *China Economic Journal* 在 2010 年由黄益平、蔡昉担任特邀主编的一个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专刊，包括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黄益平、蒋庭松《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般均衡分析》，王美艳《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郇若素（Ross Garnaut）《刘易斯转折点的宏观经济学含义》，宋立刚、张永生《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吗？》和姚洋、张珂《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了吗？——基于省级数据的证据》。二是来自 *China Economic Review* 由 Belton Fleisher 教授主编的相同主题的专刊，包括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ane Golley 和孟昕《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王晓兵、黄季焜、张林秀、罗斯高（Scott Rozelle）《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自营工商业的结构性转变》，约翰·奈特（John Knight）、邓曲恒、李实《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葛苏勤、杨涛《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此外，我们还从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邀约了魏征、Marco G. Ercolani、郝睿《解析 1965 ~ 2009 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

在我们三位主编的学识和信息限度内，这 12 篇论文大体可以满足在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和严肃性这两个标准。我们的编排顺序主要依照这样的逻辑线索：第一编包括的 4 篇文章，基本上是同意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判断，并从不同角度提供经验证据；第二编的 4 篇文章主要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相关含义；第三编的 4 篇文章要么是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要么是论证了刘易斯理论的不适用性，建议采取一种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是，本文集三位主编的文章，分别被编入上述三编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力图做到，一方面把不同观点充分展示出来，给读者以全面的了解，我们自己也能够做到相互启发；另一方面也求同存异，使一些具有共同点的政策含义更加得到强调。

我们感谢 *China Economic Journal* 的主编巫和懋教授、副主编沈艳教授和 *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主编 Belton Fleisher 教授，允许并鼓励我们编辑本文集。文集集中的多篇论文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6 日在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辩论刘易斯转折点”，以及 2010 年 12 月 18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第六届香港经济学会双年会的主题讨论会上进行了讨论，因此，我们也要感谢两次研讨会的参加者，以及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有益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香港经济学会和南开大学为研究和研讨会提供了资助，我们也在这一并表示感谢。

第一编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蔡 昉

摘 要：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与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 未富先老

一 引言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支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仍然方兴未艾。笔者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Cai and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caifang@cass.org.cn。

Wang, 2005), 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 估算出人口红利对 1982~2000 年期间人均 GDP 增长率的贡献为 26.8%, 同时指出, 随着大约在 2013 年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提高,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其他的文献中(如蔡昉, 2008; Cai, 2008), 作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 作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揭示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对于上述判断, 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持赞同的态度, 也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在最初的文章和答复性文献中(蔡昉, 2008), 笔者尝试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从不同角度印证所得出的判断。但是, 对于经济现实中的表现,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 常常得出大相径庭的理解。对相同的现象, 也往往会作出不尽相同的解说, 得出相异的结论, 见仁见智。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 中国人口基数大, 劳动力数量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 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 如果认为(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 以至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①。无论是针对笔者的批评意见, 还是对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的一成不变的认识, 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 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 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 使得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 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Young, 1992), 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基础十分不牢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中国改革发生得太快, 以致统计改革不能及时跟进(Ravallion and Chen, 1999)。例如,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8 年农业劳动力为 3.1 亿人, 占全国劳动力比重至今仍然高达 39.6%。而由于统计口

① 本文不拟讨论由于对刘易斯转折点含义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观点分歧。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参见 Lewis, 1972; Ranis and Fei, 1961), 笔者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 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 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 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 称作商业化点, 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径的因素，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而事实上，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Cai and Wang, 2008）。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提高程度，可以认为农业中实际容纳的劳动力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此，基于汇总统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如 Lau, 2010），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Minami and Ma, 2009），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第二，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的日趋多样化，特别是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城镇就业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仅不再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占主导的就业结构，而且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与此同时，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就业，总量超过 2.3 亿，其中 1.5 亿进城务工。在常规统计中，城镇居民中的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的就业，除了通过汇总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约 1 亿人的总量和占城镇总就业约 30% 的比例外，通常没有可供进行分部门分析的数据（Cai, 2004）。此外，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能反映现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字，使得许多学者作出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因此，许多研究者仅仅依据有关统计年鉴上的正规就业数据，以及任意性比较强的估计，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状况，得出就业零增长或者失业率仍然很高的结论（如 Rawski, 2001），以至当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时，许多人无法接受其为真实的存在。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有关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实际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一致^①，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并且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人口预测报告，一般读者更是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

① 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 1.32，甚至低于 1.51 的政策生育率。许多人对此提出怀疑（于学军，2002）。自此之后，关于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趋向于认为仍然较高，学者相信的数字偏低。即便如此，争论的幅度也在 1.6~1.8 之间，远远低于 2.1 的替代水平。

值在 2040 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量为 16 亿（如刘遵义，2010）。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的现实，以至不愿意相信人口红利的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可见，对于人口转变格局与趋势的认识，将有助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正确理解，更是旨在挖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潜力的相关政策的决策基础。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说明，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过程重合，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本文其他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从理论和国际经验角度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第三部分用数字描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回答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问题；第五部分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小结，并揭示政策含义。

二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以刘易斯（Lewis，1954）为代表性作者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广为人知。该理论把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区分为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前一部门中存在着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严重过剩的劳动力，因而边际劳动生产力为 0 甚至为负数。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就业，形成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在学说史上几经沉浮（Ranis，2004），二元经济理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中最具有核心地位的理论模型。

但是，甚至在刘易斯最初文章发表之前，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的成熟形式已经公开发表^①。对应工业化前后发展时期，该

① Thompson（1929）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随后有人又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做出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标准理论解释，所以，“人口转变理论之父”的称号被授予了 Notestein（1945）。关于这个领域学说史的简述，请参见 Caldwell（1976）。